

# SCIENCE MUSEUM GROUP

国际研讨会

## 文化历史与全球视野中的 中国科学、科技与医疗

**DATES**

2018年6月3日至4日

**VENUE**

唐纳研究中心与图书馆

# 目录

3	引言
4	<b>6月3日（星期日）</b>
5	<b>6月4日（星期一）</b>
5	博物馆、档案、展品与国际合作
6	中国医疗、植物学与民族志
8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学、技术与医疗
9	中场
10	现代与当代中国的科学与科技
11	总结

# 引言

国际交流合作能够带来新的视野与观点，  
从而使我们在英国的规划更丰富多元。  
在更广的层面上，  
国际交流合作将促进国家之间的理解并深化合作。

科学博物馆集团，启迪未来：重点战略性计划 2017–2030

虽然关于艺术与文化史藏品的研究长久以来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英国的科学藏品在科学、技术与医疗历史中却长期呈现出一个以西方本位或英国国家为本位的现象。科学博物馆集团通过在研究、收藏与展示方面的跨国合作，致力于为参观者提供科学、技术与医疗历史的国际性视野。近年来，科学博物馆不仅通过与包括俄罗斯（〈航天员：太空时代的诞生，2015-2016〉）和印度（〈印度的科技创新，2017-2018〉）等国的国际合作策展，举办了许多重要展览，而且也与在巴西、日本、中国、南韩与欧洲等国家地区建立了许多合作伙伴关系。

对科学博物馆集团而言，中国是在2017至2030年间的一个重点合作伙伴。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已经规划了一系列中英合作计划，并将带来大型展览，探索中国科学、科技与医疗。这些计划中包括2023年将在科学博物馆展出的展览，同时，也计划将此展览在英国其他博物馆、欧洲其他国家的博物馆、甚至中国的博物馆巡回展出。本次国际研讨会〈文化历史与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科学、科技与医疗〉是科学博物馆集团第一次邀请学术研究人员与博物馆专业人员联合，以中国科学、科技与医疗为主题分享知识、建立关系、并探讨新的角度与视野。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要目的包括：

- 建立学者与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 促进专业知识的分享
- 开启科学博物馆集团关于2023年于伦敦举办的探索中国科学、科技与医疗展览的思考
- 通过在博物馆网站上发布研讨会上的会议报告与研讨会成果报告将知识与思想传播给更广泛的公众

来自5个国家共计15个城市的50多位代表参加了科学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科学、科技、与医疗：文化、历史与国际交流”国际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在2018年6月3日至4日在伦敦科学博物馆举行。本研讨会包含四个主要主题：

- 博物馆、档案、展品与国际合作
- 中国医疗、植物学与民族志
-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学、技术与医疗
- 现代与当代中国的科学与科技

感谢中英卢瑟福研究员袁雁悦与朱敬筹办这次研讨会，这是她们在伦敦科学博物馆研究与大众历史以及策展部门任职期间研究工作的一部份。我也要感谢所有带来学术报告的主讲人与主持人，感谢他们参与为期两天的国际研讨会。最后，我也要特别感谢商务、能源与工业策略部门提供资金赞助本次研讨会。

此份成果报告概述了研讨会上探讨的丰富主题及个体报告与讨论的关键内容。

**堤立·布里斯(Dr Tilly Blyth)博士**  
伦敦科学博物馆首席藏品与策展负责人

# 6月3日（星期日）

发言人

---

克里斯多福·库伦（古克礼）  
(CHRISTOPHER CULLEN)

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名誉退休教授

范发迪(FA-TI FAN)

纽约宾汉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李丞浚(SEUNG-JOON LEE)

国立新加坡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

---

克里斯多福·库伦（古克礼）：〈遗漏的物件：将物象研究回归于近代以前东亚科学史中〉(The Missing Object: Putting Things back into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Pre-Modern East Asia)

“对于天文学科技史的研究最终可能是一个现代专家对一个古代专家的讨论。但天文的领域远比专家的个人讨论还要来得广。天文学的抽象观念是如何从人们观察星象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

古克礼主张博物馆展品应当超越「单薄的描述」（通常伴随着标签上的抽象词汇，及描述其功能的科学术语表达），并试着提供「浓厚的描述」（包含物理的、社会的、经济的与知识的产生过程与关系），如此才能与大众交流并展现科技是如何运作的。他介绍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其论点：他自身作为一个用古代中国传统中以肉眼观察星象的经验，使用简单的仪器像是日晷与水钟，以及他对「日内瓦轮盘」的研究，这是一个十七世纪日本被设计来给非专家使用的天文学仪器。古克礼相信透过呈现对象的丰富历史及其多重意义，博物馆能重新发现人类历史中对象复杂的真相。

范发迪(Fa-ti Fan)：〈晚期帝国与近代中国的自然收藏〉(Collecting Natur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获取自然界知识的方法是如何改变人们理解自然界的方式？”

通过比较中国帝国时期晚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与欧洲地区这两大传统收藏与展示自然、科学、科技、与医疗物品的异同之处，范发迪揭示了人们如何观察、诠释与呈现自然物品。他质问随着时间变化与文化变迁的「自然对象」的含意，考虑许多种人们寻求来获致、保存、与收集自然对象的方式，而这些方式是从命名与编目到定义与归类，吻合我们宇宙观的架构。

他透过呈现对相同对象的对立观点，指出意义是在于「观者的个人角度」，例如对于飞鱼的自然历史记载，在一个有学识的中国人笔下和一个渔夫的笔下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他也透过呈现许多物种的例子，这些例子分别是由没有亲身见过物种本身者与亲身见过物种本身者所撰写成，来探讨阅读文字（文字理解）与亲身所见一事物在原本的位置（视觉理解）之间的鸿沟。最后，范发迪讨论中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出现，并讨论人们是如何看待此类博物馆。如此，范发迪提出了许多未解的问题：中国人收藏了哪些对象，以及为什么收藏这些对象（尤其是这些关于自然的对象）？「自然」的含意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含意又是什么？不同时代的人们又是如何呈现自然的

李丞浚(Seung-joon Lee)：〈二十世纪中国的科学、食物、与能源〉(Science, Food and Energ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食物是科学家研究中的一个较难入手主题，因为它难以量化。从适口性到饮食习惯，食物是非常私人化的—因而难以从全球范围来研究”。

李丞浚探讨了食物、能源、与营养科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角色。他提出在中国工业化之前食物是最主要的能源，它为劳动力提供能量，且因此塑造了以「工人的身体」为工业化力量的象征。李丞浚的研究聚焦于工业食堂，它集中体现了国家管理与权利对最大化劳力生产输出的诉求，并将其视作让中国更为强大的一种方式。李丞浚讨论了营养科学的相关研究与宣传活动如何传播营养学与饮食的概念，以及对于谁值得拥有最多的食物的考量（即军人与工人）。他也介绍了西方观念对中国公众健康与营养的影响，例如来自美国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影响，美国汽车企业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著作《我的工业哲学》所带来的影响。从饮食管理到工业食堂到粮食短缺与分配，李丞浚的文章展示了「营养主义」作为观念的科学以及国家潜在对个人的影响力所在。

---

研讨会第一日以科学博物馆的导览结束，艾莉森·波尔(Alison Boyle)与堤立·布里斯(Tilly Blyth)为嘉宾介绍了三个展馆的展览：〈现代世界的形成〉(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及〈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 与〈数学：温顿馆〉(Mathematics: The Winton Gallery)。

# 6月4日（周一） 博物馆、档案、展览品与国际合作

发言人

---

霍吉淑  
(JESSICA HARRISON-HALL)

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中国与越南分部负责人

布兰登·科米尔  
(BRENDAN CORMIER)

维多莉亚与艾伯特博物馆20与21世纪蛇口合作计划首席策展人

柯莉娜·加登纳  
(CORINNA GARDNER)

维多莉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数字设计部资深策展人

---

霍吉淑：〈陈列中国科技〉(Displaying Historic Chinese Technology)

“对地理多元性与比例的意识是我们策划新展馆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份。”

霍吉淑介绍了大英博物馆何鸿卿爵士展馆(Sir Joseph Hotung Gallery for China and South Asia)于2018年第二次翻修完成后开幕的展览。此展览探索中国新石器时代到当今的视觉艺术与物质文化的历史。霍吉淑邀请听众从科学与科技的视角探索这次新开幕的展览，展品包括：线圈制与轮制陶器、玉器、建筑、铜铸品、书写作品、漆器、雕像、瓷器、食品科技、画作与印刷。她也讨论了展览这些藏品所遇到的挑战，包括将它们展示于展馆原本爱德华时期的橱窗中，以及需要涵盖中国长久历史与多元地域差异的难点。霍吉淑也谈及这些展览品是如何与当代物品（以及艺术品）相整合，来呈现当代与历史时期的关联（例如郑祎(Caroline Cheng)的蝴蝶汉服由景德镇陶艺家使用二万五千只手工陶瓷蝴蝶制成）。霍吉淑也讨论了赞助者的角色以及金钱对科技生产的影响产品上的力量，探讨了跨国与国际交流、通过物品为媒介带来的转移与科技输出（例如亮片技术的转移）、以及科技的输入，例如时钟、手表、以及小型自动机械人。

布兰登·科米尔：〈探索深圳「不被识别的设计行动」〉(Exploring Unidentified Acts of Design in Shenzhen)

“珠江三角洲的设计发生在何处？在一个如此密集投资、低生产成本、又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地区完成的这些设计如何表现？”

布兰登·科米尔介绍其近来参与的项目，包括在深圳建筑双城双年展中举办的「未被识别的设计行动」(2015)展览以及位于深圳的维多莉亚与艾伯特博物馆(2017)设计互联(Design Society)。他讨论寻找在未预期的地点所设计创作与制作的方式，提出问题如「现今创作设计是在城市的何处发生的？」、「谁是演员？」以及「设计与制作的行为是什么」，并从「中国制造」过渡到「中国创造」。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要检视探讨设计者工作室之外的设计空间。他介绍了八个研究案例，并讨论了寻找故事线的过程，主要通过在城市中的实地考察来寻找创造者，对他们进行访谈，并与他们一同创造图像来呈现一个关于中国的「高分辨率」故事。

柯莉娜·加登纳：〈维多莉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快速回应收藏〉(Rapid Response Collecting at the V&A)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主动的倾听者，并采取一个更多元与广博的提问态度来看待未来的世界。”

柯莉娜·加登纳介绍了维多莉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快速反应」收藏，主要针对公众当下的讨论来获取博物馆的永久藏品。这一收藏方式是希望加深对目前设计与现代世界的理解，并且提出问题：什么是当今的设计？收藏又具有什么意义？她分享了一些例子，包括「新愤怒鸟」软件、一款与微信相关的绒毛玩具、一款粉色毛线帽（美国女权游行时人们戴的帽子），并体现公众与媒体对这些事物的不同反应。加登纳也讨论了一项在深圳的计划，此计划邀请居民用物品创作一款城市的写照。她论及了这些收藏计划背后的目标：引发公众讨论与辩论、对与设计相关的焦点社会事件作出回应、艺术与工业的交集、以及当代设计的趋势与价值。加登纳提及「快速反应」收藏体现了博物馆主动向员工及大众寻求意见的举动。

# 中国医疗、植物学与民族志

发言人

---

何安娜(ANNE GERRITSEN)

华威大学历史系教授; 莱登大学欧亚文化交流研究基科曼主席

裘登·古德曼  
(JORDAN GOODMAN)

伦敦大学科学与科技研究系荣誉研究员

高晞(XI GAO)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敬(JING ZHU)

中英卢瑟福研究员, 本次研讨会组织者

---

何安娜: 〈英国的身体与中国的大黄: 植物学知识里对中国的呈现〉(English Bodies, Chinese Rhubarb: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 through Botanical Knowledge)

“在西方, 由于人们的偏见, 大黄与中国的关联使得中国大黄难以销售。”

何安娜探索西方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对中国大黄作为医疗草药的兴趣。她论证在这段时期西方看待中国大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而这三个阶段随着政治发展演变: 首先, 大黄作为一种多产且产量大的草药, 而中国被视为栽种与培养大黄以及理解其医疗功效的权威。接着, 随着西方兴趣的提升, 大黄成为一项商品且自动地变得与中国脱离关联。最后, 大黄被视为一个有用的产品, 得以驱离身体中的有毒物质。然而, 在这个最后阶段大黄与中国的关联变得具有争议, 且随着消费者倾向选用「土耳其大黄」而使得中国与大黄的关系愈来愈被避免提及(即使土耳其大黄与中国大黄在质量上并没有真正的差异)。何安娜藉由考察大黄的产量、贸易、与消费, 展示了文化偏见与消费型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裘登·古德曼: 〈广州的艺术与植物学: 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及其《中国植物大全》(1767-1773) (Making Art and Botany in Canton: John Bradby Blake and his 'Compleat Chinensis' (1767-1773))

“...一个独特的跨文化合作案例: 一位住在广东的东印度公司居民、一位中国艺术家、不计其数花园的园丁、以及一位懂中英文的中介人”

裘登·古德曼发表他与约瑟发·里查(Josepha Richard, University of Bristol)与彼得·蔡恩(Peter Crane, Oak Spring Garden Foundation)共同合作完成的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研究。他说明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出生于1745年)的精彩故事, 他是一位东印度公司商人(从1766年他前往广东做茶的交易)、艺术家、园艺家、植物学家, 并与一位中国艺术家与园丁创作中国植物与动物的科学水彩图像。布莱克自己也种植许多植物来尝试更深入了解其研究对象的栖息地。不幸的是, 几乎没有关于中国贡献者的纪录被发现。大约在1774年, 布莱德比·布莱克和他的中国合作伙伴的作品被寄往伦敦, 包含约两百幅很棒的中英植物画作, 这些画作是被上色、精确描绘、并且符合最新的伦敦林奈学会所订定的原则(Linnean principles), 并且伴随许多笔记。虽然《中国植物大全》从未出版, 这部作品被认为是第一部中英合作的植物学书籍。这个「意外的」从下到上的伙伴关系与创作也反映着对象的身份变迁。

高晞：〈中国医疗博物馆的双重创建理想〉(The Dual Founding Ideal of Museum of Chinese Medicine)

“中国医药历史博物馆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公众图书馆之一”

高晞讨论中国的中医药博物馆，尤其聚焦于她超过三十年来每年均邀请复旦大学学生参访的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高晞以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为例，追溯中国中医药博物馆从十九世纪基督教传教士的介绍到今天的演化历史。高晞主张在中国中医药博物馆的历史有三阶段：在1949年以前，博物馆追溯传统中国医学的历史并寻找中国传统医药与西方医药的链接。在1950年代，中医药博物馆进入了一个政治动力强盛的时期，欢庆中医药的民族性成就及其对世界的贡献。最后，高晞指出自从2000年以后，人们开始将中医药与西方科学均当作是通往「现代生活」的途径。透过这三个关键的阶段，高晞追溯过去七十年来中医药的诠释历史。最后，高晞介绍传统中医具有代表性的铜制针灸人像，以及关于其渊源、所有者、复制品、对象传记的讨论，这些讨论反应不同利害关系人从中医药的宣扬者到高科技应用者之间的紧张性。

朱敬：〈1930至1940年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体摄影：人体测量学、博物馆收藏与性别〉(Photographing Bodies of Non-Han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in the 1930s and 1940s: Anthropometry, Museum Collections and Gender)

“使用盛装视觉呈现非汉族的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现象，它是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类学、与博物馆兴起的影响下于民国时期所形成。”

朱敬关注百苗图，一种中国晚期帝国描绘西南边境的少数民族的绘画，以及1930年代至1940年代呈现非汉族的人种志摄影，来检视在不同媒体与不同历史时期重现的非汉族身体图像的视觉转变。朱敬观察到百苗图中，普遍而言是少数民族群体包括男人、女人、老者、与小孩均有被刻画；然而在现代摄影中，个体身体是被强调的，并且许多照片是被设计来呈现非汉族身体的不同面向。朱敬解释此类可视化当地人民的方式是与发展在十九世纪西方的人体测量学、人体测量科技与人种科学无法分开的。她发现也只有非常简单与日常的非汉族服饰被呈现在百苗图中；而非汉族女性于盛大节日穿著服饰的图像在民国图像期刊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种类。朱敬主张用节日盛装呈现少数民族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现代建构。大量非汉族盛装服饰照片出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和对物质文化的兴趣相关，它广泛地展现在博物馆与其他机构当中。节日盛装照片广受欢迎反映的是对非汉族服饰与其他物质文化对象的收藏与展示与人种和演化理论。最后，朱敬指出大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汉族的图像是年轻女孩的照片，它呈现了女性化中国非汉族的过程。因此，为了获得对人种志图像的创作与再创作的一个更全面理解，跨学科综合考虑人种科学，性别，博物馆与政治的探究显得非常重要。

#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学、科技与医疗

发言人

---

约瑟夫·麦克德默  
(JOSEPH P MCDERMOTT)

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荣誉成员；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长谷川正人  
(MASATO HASEGAWA)

柏林普朗克科学史研究中心第三部门博士后研究员

立斯里·玮伦斯  
(LESLIE DE VRIES)

肯特大学宗教研究系东亚研究助理教授

董煜宇(YUYU DONG)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

约瑟夫·麦克德默：〈造纸与印刷技术及其西传〉  
(**Paper-Making and Printing Technologies and their  
Westward Transmission**)

“直到十八世纪西方人才得知中国与欧洲不同的活字印刷术。”

约瑟夫·麦克德默使用造纸与印刷科技的历史作为例子，展示中东历史在欧洲与亚洲传播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比较中国与欧洲印刷与造纸的早期例子。藉由比较两者的科技与设备，他展示了这两个不同传统的相异之处。麦克德默也提出疑问，就科技传输的角色：第一个传递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纸制品与印刷对象是什么？是否有抗拒的情形存在？欧洲与中国人民是如理解与学习外国科技？麦克德默探索了许多例子，包括从一本由中国宫廷寄出到梵蒂冈的书籍到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翻译作品。然而，麦克德默总结说明这个传播历史是不能被全盘理解的，除非历史学家解决中东历史，这个扮演中国与欧洲传递角色者缺乏史料证据的问题。

立斯里·玮伦斯：〈视觉化无形之物：赵献可《医贯》(1617?)  
之研究〉(**Visualising the Formless: A Case Study of Zhao  
Xianke's 'Thread that Runs through Medicine' (1617?)**)

“我们如何了解身体？这些知识是如何导致新的医药治疗？”

立斯里·玮伦斯的文章聚焦于赵献可的《医贯》(1617?)。赵献可的作品是一个广受欢迎但在明代早期却是一个饱受批评的医疗方式。立斯里探索赵献可在世时候《医贯》所遇到的强烈批评。他接着探索赵献可的医疗方式是如何在越南被接受并且成为越南医药界的民族英雄。最后，这个案例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横跨东亚的观念与实践医疗的转移与诠释的疑问。

长谷川正人：〈晚期帝国时期中国的畜力与人力运输〉  
(**Transport, Animals and Human Labou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我们必须思考联系彼此的不同运输模式，而非作为独自存在的科技。”

长谷川正人检视在中国帝国晚期，当相似的运输科技都可以使用的时候，人们是如何决定使用哪一种运输模式的。长谷川探索船只、推车、驮兽、以及人力等运输模式，并考虑一个国家的地形与气候以及人们对于这些运输模式的想法，不管是真实的或想象的，是如何影响选择移动的方式与运输的基础建设。他总结到当研究运输科技时，历史学家应当考虑光谱上的所有可使用的选项，以及引导人们采取不同选择的想法与决定的过程。

董煜宇：〈知识、管理、与科技创新：北宋时期中国水钟的发展〉  
(**Knowledge, Administration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ater Clock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北宋时期燕肃、沈括、与苏颂所制造的天文学仪器水钟得以利用水来测量时间的经过，而同时它也是帝国力量的一个象征”

董煜宇从北宋时期到耶稣会士于十七世纪引进了机械钟为止追溯了中国水钟科技的发展。他的文章说明水钟与人们尝试了解天文学与自然世界的紧密关联。董煜宇展示了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的关键角色。利用水钟作为例子，董煜宇透过国家的管理，其作为一个科技与科学既得利益者，论证科技的演变。这样的管理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接合点给许多从火药到枪炮科技的「伟大中国发明」。



# 中场

发表人

---

麦可·克拉克  
(MICHAEL J CLARK)

伦敦国王学院人文与健康研究中心; 伦敦大学中国人文与健康研究中心

---

麦可·克拉克: 〈中国电影的新面向: 仁康医学, 一个推广中国医学人文与电影的中英合作网站〉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ese Movies: YiMovi, an Anglo-Chinese Collaborative Web Site for Chinese Medical Humanities and Film**)

麦可·克拉克介绍仁康医学, 一个通过中文电影来促进人文医学的教学与公众参与的双语网络资源。克拉克讨论了计划的形成与发展, 它是一群国际学者的合作成果, 这些学者主要来自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国王学院、以及北京大学医学人文中心(由威尔康基金会出资创建)。他讨论了中国电影与人文医学教学结合的实验性进程(以中国为焦点)。电影素材以主题划分, 有些电影并没有明显的医学主题(比如涉及老年、死亡、代际关系)。他接着播放了部分电影选段。

---

<https://www.yimovi.com/en>

# 现代与当代中国的科学与科技

发言人

---

奥利佛·贝兹  
(OLIVER BETTS)  
与托马斯·斯班  
(THOMAS SPAIN)

国家铁路博物馆策展人

蔡维屏(WEIPIN TSAI)

伦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李海静(HAIJING LI)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

---

奥利佛·贝兹与托马斯·斯班：〈输出的铁马：凯尼斯·肯特利(1899-1986)、中国铁道系统与英国火车头的建造〉(The Exported Iron Horse: Kenneth Cantlie, China Railways and British Locomotive Construction)

“我们的参观者对现代中国的故事有多了解？这个对象的故事能给现今人们带来哪些改变？”

这次的报告从介绍一个由国家铁道博物馆拥有的科学博物馆群的对象开始：600型的火车头，编号607，又称做KF-7。在1979年这部火车头出现在英国国家铁道博物馆，它是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赠送给英国人民的礼物。运用火车头设计者凯尼斯·肯特利(1899-1986)的个人档案与手稿，汤马斯概括性地说明了这个对象目前已知的横跨中国与英国的历史传记。

奥利佛·贝兹接着讨论我们对于这件极棒的对象知识上的空白处，包括1938年后这部引擎发生的事情、中国火车人员在车上的服务故事、以及这部火车头与其他科学博物馆收藏的关系。他也提出疑问，关于我们如何向铁道博物馆参观者展示这个穿越亚欧与两个世纪的物件，以及其复杂历史的问题。最后，贝兹與斯班呼吁学界一起联合完成这个火车头设计传奇的历史研究。

蔡维屏：〈二十世纪初华北邮政路线的设计及其与铁路线的关连〉(The Design of Postal Routes in Relation to Railways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铁路让焦点从中心/首都转向通商口岸的条约港口、省会首府、以及内陆省分的链接与高速公路。”

蔡维屏展示了她研究二十世纪早期中国邮局散布地点与铁路扩展时，所使用的中国邮政邮务地图。她的研究包含国家邮政系统的主要竞争者、扩张的策略、以及立法内容。她也论及邮务服务作为一种软性帝国的力量，带有公众教育的活动、在地方小区中心建立分部、雇用能使用地方方言的人员、并使用商标来促进建立当地居民与帝国邮务之间的链接。透过她对邮局扩展的研究，蔡维屏追溯了中国铁路网发展的历史。

李海静：〈从防御到控制：钱塘江防洪与控制方式的演变，1927-1949〉(From Defense to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pproach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 the Qiantang River (1927-1949))

“在1927-1949年之间，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因此国家经济能够支持河流控制计划”

李海静介绍了1927-1949年的钱塘江计划工程。她分析了人们对钱塘江工程的看法和反应的变化，从原本寻求防护土地与社区免于「危险且具有破坏力潮汐」的计划，转变为一个尝试控制河流潮汐的计划。她的演讲也涉及了中国与西方看待此问题的不同角度，中国将此类问题视为「灾难」且因此希望运用资源控制河川，而西方将此视为自然问题并寻求理解这些自然灾害背后形成的原因。她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体现了人们对河川泛滥这一问题的观点与解决方案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

# 总结

本次国际研讨会中生发了丰富且发人深省的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四个主题

## 呈现不同视角的重要性

相关讨论包括：

- 表现从下而上、地方性的见解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此部分历史变得高度全球化且缺乏意义。
- 「好管闲事者」的重要性，也就是那些并不是按照组织特权指示来行动者，以及那些根据自身专业与技艺的行动者，他们对知识多元化的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 在不同历史与政治时期运用区域传统与国家传统来互相比较，是理解技艺发展的重要架构。
- 科技在不同文化脉络与文化中有不同的价值。
- 使用地方人民的地方知识来帮助管理与理解一个国家的地域，这是否是一个了解不同面向或由下往上的历史的方式？
- 探索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服务科技 – 邮局、银行、能源 – 来揭露不同社会与专业的面向

## 探索博物馆在塑造故事与思想中扮演的角色

相关讨论包括：

- 作为文化生产的博物馆
- 负责收藏代表科学、科技与医疗史藏品的博物馆会因为文化不同与时间框架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角度与计划。
- 博物馆展陈如何包含对于殖民历史相关责任的认知？

## 对博物馆物品的阐释

相关讨论包括：

- 物品没有稳定不变的含义，它们是持续变动的存在，它们没有固定不变的纪录。
- 关于中国科学的物品如何契合西方的分类法？关于西方科学的物品又如何契合中国的分类法？
- 当我们关注展品的中国渊源时，会对英国藏品的阐释会受到怎样的挑战？

## 文化交流的过程

相关讨论包括：

- 知识的传递：我们如何研究知识与思想的移动性？哪些知识是移动的，哪些是不会移动的？哪些传递地快，哪些传递地慢？哪些内容能被传递？哪些内容不能被传递？
- 我们总是需要某个人来决定知识的传递？在不同文化之间是否通过一本书或文字本身就足以传递知识？或者说，在知识的传递过程中，人做为中间媒介是不可或缺的因素？